

Chu, A.L. and Harsin Drager, E. (2019). After Trans Studies.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6(1), pp.103–116.

作者：朱华敏（Andrea Long Chu）和 埃米特·哈辛·德尔格（Emmett Harsin Drager）

译者：許顥頊（代词 they/them/祂/佢/TA）

对本译文的说明（部分直接复制自译者之前译文内的声明）：

1.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词汇、结构等），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另外，【】内除表示数字外，也为译者注解内容。

2. 译者的翻译是机械且僵硬的，完全没有把握住行文的细微差异（nuance），译者不做细分，也认为纠结于此没有意义。

3. **sex** 译为“性”、**gender** 只译为“性别”；当 **trans** 独立使用时翻译为“跨儿”，其它情况下翻译为“跨性/别”；**transgender** 译为“跨性别”；**transsexual** 译为“跨性”（本译文虽希望保留其历史含义与当代诠释，但完全不希望其作为译文被引入时，被译为“变性”这样在部分中国跨儿与非二元者社群中被视为具有贬损色彩的词汇）；**the transsexual** 译为“跨性、跨性（者）、跨性者”；**tranny/trannies** 翻译为“变性人”（注意 tranny 这个词现常被跨儿和非二元者用来自我指称）；**woman** 译为“女人”。

读者需要注意跨性（transsexuality）以及跨性别（transgender）两种叙事模型的不同。

4. 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对话：在跨儿研究之后

Dialogue: After Trans Studies

摘要 (Abstract)：这场对话斗争的是今天跨儿研究的状况。虽然两位作者对其未来的乐观程度不同，但TA们都同意，如果跨儿研究要生存下去，它必须要能够清晰阐明一套与酷儿研究 (queer studies) 不同，甚至与之相悖的，全新的阅读/解读实践 (a fresh set of reading practices)。通过再访桑迪·斯通 (Sandy Stone) 1991年定义这一学术领域的文章《帝国大反击》 (“The *Empire Strikes Back*”)，TA们指出，跨儿研究自相矛盾地从呼吁放弃跨性者的形象作为其始出 (paradoxically begins with a call to abandon the figure of the transsexual)，将跨性者仅仅构想为一个规范性的医学类别 (a normative medical category)。相反，作者们认为，跨性者 (the transsexual) 的批评性价值 (the critical value) 恰恰在于她作为反规范性酷儿性的浪漫叙事 (romantic narratives of antinormative queerness) 的一个障碍 (obstacle)。

关键词 (Keywords)：跨性 (transsexual)、跨性别研究 (transgender studies)、叙事情节的设置 (narrative emplotment)、性别诊所 (gender clinics)、反规范性 (antinormativity)

朱华敏 (Andrea Long Chu)：让我们正视这件事：跨儿研究已经结束了 (Trans studies is over)。如果它还没有，它也应该结束了。到目前为止，跨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建立一套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以区别于性别研究或酷儿研究 (gender studies or queer studies)。苏珊·史崔克 (Susan Stryker 2004) 曾经写道，跨儿研究是“酷儿理论的邪恶双胞胎 (queer theory's evil twin)”。她错了：跨儿研究是酷儿研究在子宫里吃掉的双胞胎。(照例，这子宫是女性主义) 【Trans studies is the twin that queer studies ate in the womb. (The womb, as usual, was feminism.)】每个人都知道的是，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从来没有对傲慢擅取将性别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场所之一有任何疑虑 (qualms)，并且这么做是合理的，因为试图研究性意识/性存在 (sexuality) 而不研究性别 (gender) 将是明显的荒谬。酷儿 (Queer) 从一开始就同时描述着性别偏常僭越者和性

的1偏常僭越者 (gender and sexual deviance) ，更重要的是，性别作为性的偏常僭越 (gender as sexual deviance) ，性意识作为性别的偏常僭越 (sexuality as gender deviance) 。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儿研究只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冗余——垃圾DNA (junk DNA) 。

在跨儿研究中，没有像本世纪前十年 (the mid-aughts) 在酷儿理论中发生的关于酷儿时间性 (queer temporalities) 的丰富对话，也没有像最近黑人研究 (black studies) 中关于非洲悲观主义 (Afro-pessimism) 的辩论，这两者都要归功于一场场论战 (polemics) (Edelman 2004; Wilderson 2010) 及它们随后的余波 (subsequent fallout)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着陈腐炒冷饭般的虔诚 (warmed-over pieties) 。这就是当大量的酷儿方法及概念被卸下，忽略自身时效，匆忙地转移并贴上跨儿的标签 (a massive offload of queer methods and concepts with the label TRANS hastily slapped over their expiration dates) ，遭遇，当前跨性别身份政治所带来的政治资本的涌入 (an influx of political capital courtesy of the current transgender identity politics) 所会发生的事情。其结果是类似教堂这样的东西。但是，从理论建设 (theory building) 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东西是纷争冲突 (strife) 。谈论到学科的形成 (discipline formation) 这个话题时，我是非常保守的。我们需要少量的非常好的专著 (monographs) ，那些我们可以真正地互相吼叫的专著。你能想到今天在跨儿研究中哪怕一个意义重大的辩论吗？争吵 (bickering) 随处可见，但真正的分歧 (disagreement) ，即诞生理论的那种分歧，却少见。我们为什么对彼此这么和蔼友好？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渴望一场战斗。《论喜欢女人》 (“On Liking Women”) (Chu 2018) 就是一种孤注一掷 (a desperate attempt) ，希望与人产生分歧的尝试。然而在这一点上，它基本上是失败了。

朱华敏 (Emmett Harsin Drager) : 我无法提供你想要的分歧，也许只能说我不认为跨儿研究已经结束了，事实上，我认为它有可能处于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十字路口上。我认为，一些关于跨性/别者 (trans people) 和在跨儿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文本，都是非跨性/别

¹ 此处的“sexual”指的，倾向于性行为 (sex act) 、性欲望 (sexual desire) 等方面的“性”；而不是，所谓的“biological sex (生物性别)”的“性”——译注。

(即, 顺性/别) 学者重复使用相同的引用、概念和隐喻的作品。² 哪位顺性/别学者 (cis scholar) 会介入然后说: “嘿, 我认为我们对不安 (dysphoria) 这一概念的理解其实完全是错误的?”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相反, 我们得到的是对于身体自主性 (bodily autonomy) 的相同论点, 身体改造的激进潜能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body modification), 或者更糟糕的, 来自顺性/别者们 (cis folks) 的论点, 关于为什么社会过渡和医疗过渡一样有意义和变革性 (why social transition is as meaningful and transformative as medical transition) 。即使是在这个领域的跨性/别学者中, 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手术实际上会有多扫兴 (anti-climactic), 或者说不安 (dysphoria) 也许永远不会消失。这么做将被视为破坏着我们逐步走向“进步 (progress)”的进程。你引用埃德尔曼 (Edelman) 作为我们需要的论战类型的例子。我们正处在跨性/别小孩的时期 (the era of the trans child) 。想象一个跨儿研究的学者说, 也许事实上跨性/别儿童不应该被给予注射激素 (hormones), 这种想象会是完全

² 当我说到跨儿研究时, 我指的是自二十世纪中叶的跨性和跨性别作为身份范畴的创造 (the creation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 as identity categories) 以来所产生的医学、文化、美学、和政治理论。如果《跨性别研究读本》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Stryker and Whittle 2006) 和《跨性别研究读本·第二版》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 (Stryker and Aizura 2013) 可以作为跨儿研究如何被构成和理解的例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领域的大部分“权威经典 (canonical)”文本都来自非跨性/别学者 (non-trans scholars)。有像哈罗德·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 (Magnus Hirschfeld) 和哈里·班杰明 (Harry Benjamin) 这样的性学家和临床医生 (sexologists and clinicians); 有像珍妮丝·雷蒙德 (Janice Raymond) 【知名恐跨学者, 译注】、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和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家; 还有像盖尔·萨拉蒙 (Gayle Salamon)、海瑟爱 (Heather Love) 和马西亚·奥乔亚 (Marcia Ochoa) 这样的酷儿学者。正如 Andrea 【朱华敏】在这场对话中所说, 跨性别研究中充满了“特别容易受一时流行/狂热影响的酷儿研究学者”【trans studies is full of “queer studies scholars especially susceptible to fads”】。我挑战你给我一份你能想到的包含所有享有终身职位的跨性/别学者 (every tenured trans scholar) 的名单——别担心, 不会花很长时间的, 特别是如果你把它列成一份跨性/别有色人种学者 (trans of color scholars) 的名单 (我知道这一点, 是因为 C·莱利·斯诺顿 C.Riley Snorton 曾经向我提出这个挑战, 我想我没有列出超过四个人)。然而, 我也应该提及, 我是一个脸书 (Facebook) 群组的成员, 该群组有500多名目前在全球各地攻读博士学位的跨性/别学者 (trans-identified scholars)。也许这就是我对跨儿研究的未来的一些乐观态度 (optimism) 的来源。——原作者注

【巴特勒的大量工作确实是在顺性/别女人这样的身份下生产的, 但是, 读者需要注意, 巴特勒现在的性别身份是非儿元者, 使用代词 they/them (TA) 以及 she/her (她) ——译注。】

没有事实根据的。作为一个领域，我们不允许出现这类分歧。一切都必须是“性别肯定 (gender affirming)” (不管这意味着什么)。³

跨儿研究还没有结束，但它确实需要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作为其它东西的补遗 (an addendum)、连字符 (a hyphen)、或一个星号 (an asterisk)。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如何从这个垃圾 DNA 中获得实现某些东西。

对我来说，跨儿研究遭遇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trans studies) 一直是一种关于叙事的问题 (a problem of narrative)。我一直受到那些思考叙事在历史研究 (historical inquiry) 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学者的高度影响。正如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2000) 所认为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被叙事情节的设置 (narrative emplotment) 所形塑的。一个历史项目 (historical project) 必须采取情节构思的形式 (the form of a plot)；它的核心本身就是一种故事 (a story)：浪漫故事，悲剧，喜剧，讽刺【a romance, a tragedy, a comedy, a satire】(7)。在大卫·斯科特的《现代性的应征者》(David Scott's *Conscripts of Modernity*) (2004) 中，他认为后殖民 (the postcolonial) 正试图使用与反殖民 (the anti-colonial) 相同的工具包 (toolkit)，或者如他所说的“问题空间 (problem-space)”。他认为，虽然浪漫故事 (romance)，这种关于欣喜胜利的体裁 (a genre about triumph)，对于反殖民主义反抗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是必要的，但悲剧是描述后殖民主义现代性 (postcolonial modernity) 的一种更恰当的体裁。在跨儿研究中，在我看来，

³ 在杰西·辛格 (Jesse Singal 2018) 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上发表关于跨性/别儿童的文章前几周，我写了这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辛格正在进行一些我所声称的不可能进行的干预。虽然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身大多是一堆垃圾 (a heaping pile of garbage)，但他提出的关于跨性/别儿童的几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谁在治疗跨性/别儿童 (treating trans kids)，这些人提供的临床建议和选择，以及 (顺性/别) 家长们【(cis) parents】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保持批判性态度 (critical)。然而，辛格的文章一出来，就被迅速漠视抛在一边，辛格的顺性/别性 (cisness)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借口让我们这么做。我们没有参与介入文章的任何内容，而是迅速地把当作一个恐跨者 (transphobe) 不予理会，然后罢手去做别的事。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然而 Jesse Singal 确实就是一个可怕的恐跨钢铁顺男。跨性别学者对那篇文章有许许多多的有价值的批评以及指出那篇文章本身的各种事实错误。可参见 Grace Lavery 以及 Jules Gill-Peterson 的相关文章。读者也可延伸阅读 Jules Gill-Peterson 的文章 *From Gender Critical to QAnon: Anti-Trans Politics and the Laundering of Conspiracy* <https://thenewinquiry.com/from-gender-critical-to-qanon-anti-trans-politics-and-the-laundering-of-conspiracy/>

同时，译者认为这原文备注是可笑天真的，Jesse Singal 在这两年对跨性/别者的攻击数不胜数，言论更是越来越极端。——译注】

我们正在讲述着我们的受害者身份（悲剧）或我们的反抗（浪漫）的故事【a story of our victimhood (tragedy) or a story of our resistance (romance)】。我更感兴趣的是讽刺（a satire），一种关于在这世界上做一个跨性/别者是多么真心令人失望（truly disappointing），有时甚至无聊（boring）的体裁。正如怀特（White 2000: 8）所说，以讽刺形式讲述的历史（histories told as satires），“恰恰是通过挫败人们对以其它模式呈现的故事所镶铸的决心之类型（the kinds of resolutions）的常态期望（normal expectations）而获得其效果（effects）”。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写一个跨性/别讽刺（a trans satire）。

朱华敏（ALC）：我认为你说的很对，跨儿研究有一种叙事问题（a narrative problem）。或者说，我想说，跨儿研究继承了酷儿研究的叙事问题。作为一种分析（as an analytic），酷儿（*queer*）已经达到了分析枯竭的地步（a point of analytic exhaustion），酷儿研究的学者们不得不为批评（criticism）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行为（as a radical political act）这样的浪漫幻想（the romantic fantasy）提供其它载体（entertain other vehicles），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酷儿（*queer*）一直在庇护着这种幻想。跨儿研究的一大秘密是，它对跨儿的工作定义（its working definition of *trans*）不过就只是“再一次的酷儿（*queer, again*）”。因此，这就是跨儿研究可以提供的东西：为，如罗宾·魏格曼（Robyn Wiegman 2012）所说的酷儿研究濒危的“政治乐观主义”（*queer studies' endangered "political optimism"*），提供一个安全屋。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跨儿研究学者，实际上只是特别容易受一时的流行/狂热所影响的酷儿研究学者（just queer-studies scholars especially susceptible to fads）。

例如，细想一下，在一本书、一个章节、或一篇文章的介绍性阶段（introductory phase），学者们最渴望（most anxious to）看起来好像TA们采取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立场的阶段，大多数学者所引用来作为TA们的“方法（method）”的那篇论文（the paper）：也就是《WSQ》⁴十年前一期特刊的导论（introduction），该期特刊编辑们拒绝“跨儿”的隐性唯名论（“the implicit nominalism of ‘trans’”），而支持“跨-”的明确关系性（the explicit relationality of ‘trans-,’），‘跨-’仍保留着开放性（open-ended），并抵制因依附于任何单一后缀而过早排除关闭其它可能（resists premature foreclosure by attachment to any

⁴ 全名 *WSQ: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即《女人研究季刊》。见 <https://muse.jhu.edu/journal/396>。——译注

single suffix) ” (Stryker, Currah, and Moore 2008, 11) 。其基本思想是，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people) 作为一个有限的身份群体 (a narrow identity group) ， 可以成为一个方法论上的踏脚石 (a methodological stepping-stone) ， 用于更广泛地思考各种边界的跨越 (boundary crossings) ： 不仅仅是跨性别的 (transgender) ， 还有跨国的 (transnational) 、 跨种族的 (transracial) 、 跨物种的 (transspecies) ——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画面。因此，编辑们给我们送来了跨儿化 (*transing*) ， 也就是酷儿化的未被要求的续集 (queering's unasked-for sequel) 。像大多数续集一样，它就只是**同一部该死的电影** (*the same damn movie*) ， 只是简单地重新安排了一些情节元素 (plot elements) 。任何说是不一样的人都在撒谎。我们真的严肃认真地想象，来自1998年的任何一位研究生——我们通过想象思考的力量 (by the power of imaginative thinking) ， 从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隔间 (windowless basement cubicle) 里，在那里躲避着那些在节日聚会上离她太近的男教授们 (the male professors) ， 被拉出来的 (plucked) ， 研究生——我们真的能严肃认真地想象，这样一位研究生，在被要求描述“酷儿”意味着什么时，会回答：“哦，这是关于**坚固的边界，稳定性，还有固定性** (*firm boundaries, and stability, and also fixedness*) 。”

但我认为，**跨儿讽刺** (*trans satire*) 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质性的方法论 (a real, substantive methodology) ——不是拒绝叙述本身 (narration as such) (这是不可能的) ， 而是试图学习如何在没有乐观主义的情况下下写作 (how to write without optimism) ， 或者也许是如何在不满怀希望的情况下乐观 (how to be optimistic without being hopeful) 。然后，我确实怀疑没有乐观主义的写作 (writing without optimism) 也是不可能的，基于我被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2011: 1-2) 说服了，“所有的依恋都是乐观的 (all attachment is optimistic) ， 如果我们把乐观主义描述为一种力量 (force) ， 它使你走出自己，并进入世界，以使你接近你自己无法生成的**东西**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generate on your own*) ， 而是在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物体、项目、概念、或场景 (a person, a way of life, an object, project, concept, or scene) 之后感识而来的 (sense in the wake of) ， 满意之物 (the satisfying) 。”那么，我的意思也许是没有**政治乐观主义**的写作 (writing without *political* optimism) ， 也就是说，没有将所有乐观依恋归入到政治这

一标志之下的写作 (writing without the subsumption of all optimistic attachment under the sign of the political) 。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苦涩的乐观主义 (a bitter optimism) 。在我看来, 苦涩是我们在此处设想的跨儿讽刺的主要批判性情动/情感 (the primary critical affects of trans satire) 之一——不是愤世嫉俗 (cynicism) , 那是一种慢慢滴定苦涩直到你再也尝不到它的方式 (a way of titrating bitterness until you can't taste it anymore) , 而是真正的苦涩, 是发现世界对我们所有的欲望 (desires) 来说太小的苦涩失望 (the bitter disappointment) , 尤其是政治欲望 (the political ones) 。我知道我是苦的严酷的 (bitter) 。我感觉你也是如此。

埃哈德 (EHD) : 跨儿研究的政治乐观主义一直以后跨性 (the posttranssexual) 这一形象为基础。跨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帝国大反击: 后跨性宣言》(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1991)) 所形塑的, 在文中桑迪·斯通 (Sandy Stone) 讲述了一个关于大学性别诊所和鉴别诊断 (“性别身份障碍”) 之发展的故事 (a story about the university-based gender clin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在斯通版本的故事中, 病人们急于渴望躲过医学把关人 (the medical gatekeepers) , 会排练和表演 (rehearse and perform) TA们生活的虚假或不真实的记录 (a false or inauthentic record of their lives) , 以获得 性再指派手术 (sex-reassignment surgery) 的资格。TA们会在彼此之间传阅哈里·班杰明 (Harry Benjamin) 的《跨性现象》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 以便知道在接受采访时要告诉医生什么。斯通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强调 跨儿自我叙事化和自传的 预演的性质 (the rehearsed nature of trans self-narrativizing and autobiography) , 在这样做的时候, 她示意了关于本真性的问题 (gestures to questions of authenticity) 。她特别担忧的是“新兴的多样的声音 (emergent polyvocalities) ” (293) 被瓦解 (the collapsing of) 成一个单一的医学化的叙事/话语 (one, medicalized narrative/discourse) 。斯通将跨性/别身体 (the trans body) 描述为“一种体裁——一套具身体现的文本” (a genre—a set of embodied texts) (296) 。对斯通来说, 医学霸权 (medical hegemony) 将生活经验、具身体现、和身份的多重性 (a multiplicity of lived experiences, embodiments, and identities) 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关于跨儿性的故事 (“错误的身体”叙事) (one story of transness (the “wrong

body” narrative))、一个单一的关于具身体现的轨迹（医学过渡）（one trajectory of embodiment (medical transition))、和一个单一的身份类别（成功充当某一性别的跨性者）（one identity category (the passing transsexual))。斯通的宣言跨性(者) (the transsexual) “放弃对充当的执念 (forgo passing) , 有意识地被‘阅读’, 大声地阅读自己”, 并在这样做的时候, 接受拥抱跨性 (transsexuality) 作为一种互文性, 一种体裁的多重性 (an intertextuality, a multiplicity of genres) (299) 。

正如斯通所说, 这段关于性别诊所 (the gender clinics) 的历史为一系列二元论奠定了基础 (the foundation for a set of binaries) , 在过去三十年里, 这一系列二元论已经成为跨儿研究的核心“问题空间 (problem-space) ”: 本真性对上非本真性 (authenticity versus inauthenticity,) , 医学身份对上流俗/白话身份 (medical identities versus vernacular identities) , 以及 跨性(者) 对上 后跨性(者) (即跨性别(者)) (the transsexual versus the posttranssexual (i.e., the transgender))。我不认为斯通有意制造这些二元对立 (these binaries) , 但无论如何, 她的文章就是这样形塑了多年来关于跨儿性别、跨儿生活/生命、和跨儿身份的学术研究 (scholarship about trans genders, lives, and identities) 。⁵

斯通特别呼吁一种新的跨性(者) (a new kind of transsexual) : 后跨性(者) (a posttranssexual) ——或者正如我会说的, 非跨性(者) (a nontranssexual) 。在她的宣言中, 这领域的基础性文本中, 她敦促我们以不同于医学化的跨性(者) (the medicalized transsexual) 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在跨儿研究的基础本身之上建立了对跨性者的否定 (establishing at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rans studies the disavowal of the transsexual) 。从那时起, 跨儿研究的学者们就一直目光短浅地专注于 (myopically preoccupied with) 证

⁵ 我认为这些二元论如何被采纳的最清晰的例子之一可以在杰克·哈伯斯坦 (Jack Halberstam) 的《在一个酷儿时间和酷儿地点》(2005: 53)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2005: 53)) 中找到: “范畴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categories) 在不同的空间中也是不同的: 专家生产出的范畴 expert-produced categories (‘同性恋者 the homosexual’、‘性倒错者 the invert’、‘跨性者 the transsexual’) 最终远不如 性白话/流俗词汇 (sexual vernaculars) 或在性亚文化中生产和维持的范畴 (the categories produced and sustained within sexual subcultures) 有趣或有用。”似乎哈伯斯坦工作的核心是打算通过强调 性别扩张性的身份 (gender-expansive identities) , 扩展性别 (expand gender beyond) 到任何形式的二元论思维 (binaristic thinking) 之外; 不幸的是, 这总是以牺牲医学化的跨性者 (the medicalized transsexual) 为代价。

明我们不再是那样的人 (*that*)。现在有大量的跨儿写作 (*trans writing*)，我会将这些写作描述为是诊断性的 (*diagnostic*)，因为 (*in the sense that*) 作者们会选择当时流行的任何跨儿自传、回忆录、或电视节目 (*trans autobiography or memoir or television show*)，并证明它与过去的跨儿叙事 (*trans narratives*) 有什么不同 (例如，见 Beemyn 2006; Rondot 2016)。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些作者正在追随斯通的号召，试图诊断一种叙事学转变 (*diagnose a narratological shift*)，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从斯通所概述的医学化故事 (*the medicalized story*) 变成一种新的多样声音的、互文的、顽抗不服从的后跨性(者) (*a new kind of polyvocal, intertextual, recalcitrant posttranssexual*)。这非常符合浪漫叙事体裁的风格 (*the vein of the romantic genre*)。而在我们的诊断中，我们总是想证明我们是在“正确”的一边，或者我会说是，是在叙事学转变的“觉醒 (*woke*)”一边。

对我来说，这种不断试图证明我们不再是医学化的跨性者 (*the medicalized transsexual*) 的项目，正是跨儿研究的已生存与并将死亡 (*has lived and will die*) 之地。这是一种对抵抗和激进性的迷恋 (*an obsession with resistance and radicality*)，这严重限制了我们对跨儿过去和跨儿当下 (*trans pasts and presents*) 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兴趣回到1960和1970年代跨性者的忧虑形象 (*the fraught figure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ranssexual*)，特别是美国性别诊所的病人或有此志向的病人 (*the US gender-clinic patients or aspiring patients*)，试图创造一个更有力的跨儿历史 (*a more robust history of trans*)，这历史不是植根于流俗白话对医学 (*vernacular versus medical*)、本真与非本真 (*authentic versus inauthentic*) 的这些二元对立，而是充满着杂乱 (*messiness*)、矛盾 (*contradictions*)、失望 (*disappointments*)、和意外结果 (*unexpected outcomes*)。

朱华敏 (ALC)：我想补充一点，这不是偶然，跨性(者) (*the transsexual*) 是唯一一个跨儿 (*trans*) 可以描述而酷儿 (*queer*) 不能描述的东西。跨性(者) (*the transsexual*) 不是酷儿 (*queer*)；这是关于她最好的事情 (*the best thing about her*)。以艾格尼丝 (Agnes) 为例，这位化名的跨性女人 (*the pseudonymous transsexual woman*) 最出名的就是在50年代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性别身份诊所 (UCLA's Gender Identity Clinic) 冒充为间性 (*pose as intersex*)，以获得阴道成形手术 (*vaginoplasty*) 的机会。

哈罗德·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 [1967]2006) 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艾格尼丝的情况，现在这事例已经在跨儿研究课程中教授。(《跨性别研究读本》*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中的第六个条目。) 艾格尼丝经常被颂扬为某种性别忍者 (gender ninja)：有悟性 (savvy)、有策略 (tactical)、小心翼翼地诡骗医疗-工业综合体 (carefully conning the 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 给她想要的东西 (例如，见 Preciado [2008] 2013: 380-89)。没有人愿意谈论的是她真正想要的东西 (what she actually wanted)：一个阴户 (a cunt)、一个男人、一个房子、和该死的正常生活 (normal fucking life)。无论她对性别作为一种“设法达成的成就 (managed achievement)”有什么样的直觉知识 (whatever intuition she may not have had about)，都是用来支付新洗碗机的首付 (was put toward a down payment on a new dishwasher) (Garfinkel 1967)。如果说艾格尼丝“揭示”了什么关于性别的东西，那就是，严格来说，实际存在的规范性是不可能的 (actually existing normativity is, strictly speaking, impossible)。规范 (norms)，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存在 (do not exist)。(如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早就知道这一点，那它的解释工作做得很差。⁶) 这并不意味着规范 (norms) 没有构造 (structure) 人们的欲望；它的意思是，就其生活内容而言 (in terms of its lived content)，对规范的欲望 (the desire for the norm) 在于 (consists in) 对规范性的非规范性尝试 (nonnormative attempts at normativity)。艾格尼丝是一个非规范性的主体 (a nonnormative subject)，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反对 (against)”规范；相反，她的非规范性 (nonnormativity) 是想成为常态实际上会是的模样 (what wanting to be normal actually looked like)。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艾格尼丝在她想要的东西 (what she wanted) 和想要得到这东西对她所造成的麻烦 (what wanting it got her) 之间的间隙中权且利用 (making do)。

⁶ 公平地说，巴特勒 (Butler) 在《性别麻烦》中清楚地意识到，“性别规范是……不可能具身体现的 (gender norms are . . . impossible to embody)”。事实上，这种不可能性 (impossibility)，是性别操演性作为“行为的风格化重复”的驱动力 (the driving force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 as a “stylized repetition of acts”) ([1991] 1999: 179)。然而，她在整个《性别麻烦》和后来的《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 中隐含的假设是，规范的近似物 (approximations of the norm) 可以分为那些重新巩固规范 (reconsolidate the norm) 的类别和那些取代或再意指规范 (displace or resignify it) 的类别。其始终没有充分解释的是，这两个类别是如何分开来的。毕竟，区分它们的标准不能 (cannot) 是第一组是规范性的，而第二组不是 (the first set is normative whereas the second set is not)；相反，如果说规范是不可能具身体现的 (norms are impossible to embody)，那么这两组都是非规范性的 (both sets are nonnormative)。

我们可以争论，而且人们已经争论过，关于没有反规范性（antinormativity）的酷儿理论是否可能（Wiegman and Wilson 2015）。但是，无论在跨儿研究之后出现什么——我可以提议是跨性理论（transsexual theory）吗？——带着反规范性，跨儿研究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will be impossible *with* antinormativity）。在学术界内的这一关键时刻（at this juncture within the academy），从事跨儿研究的学者们能够做出的最有力的干预，就是捍卫这样的说法，即跨儿性（transness）需要我们理解，因为我们以前从未理解过（*as we never have before*），依附/依恋于一个规范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attached to a norm）——通过欲望、通过习惯、通过生存来理解（by desire, by habit, by survival）。

埃哈德（EHD）：我认为你这观点非常对，跨性（transsexuality）也许是理解规范和它们如何运作的关键，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只寻找反抗故事或“激进政治”故事的陷阱（the pitfalls of only looking for stories that are of resistance or “radical politics”）。我对历史冲动（the historical impulse）感兴趣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深刻的——寻找过去可能与我们长得一样、活得一样的人——的欲望所激起的（is motivated by a deep desire）。这是一个跨越时间寻找社群的项目。⁷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处理那些我们找到的、不符合我们期望的历史人物？我们想找到西尔维亚·里维拉（Sylvia Riveras）和玛沙·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s）【这样的人】，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将会找到让我们深感失望的人。我们对TA们的责任是什么？⁸

⁷ 在卡洛林·丁肖（Carolyn Dinshaw）的《理解中世纪》（*Getting Medieval* 1991: 1）中，她提出了“一种酷儿历史冲动（a queer historical impulse），一种——一方面在当时被排除在性范畴之外的文本、生活和其它文化现象（on the one hand, texts, lives, and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left out of sexual categories back then and），与，另一方面，在现在被排除在当前性范畴之外的文化现象（those left out of current sexual categories now），两者之间，建立跨时代联系（making connections across time）——的冲动”的概念。纳扬·沙（Nayan Shah 1998）也写到了这种在经由历史的异化时（in the face of alienation through history）体验到肯定和确认的欲望（this desire to experience affirmation and validation），特别是在一种同样植根于种族、族裔、和民族主义/离散（rooted in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diaspora）的寻求（seeking）。

⁸ 这些问题同样可以问及辛格（Singal）写的那些去(性别)过渡的人（the detransitioners），我们很快就摒弃TA们不予理会，因为TA们不符合我们想要讲述的跨儿性叙事（the narratives of transness）。

出于这个原因，我最近受到芬恩·恩科 (Finn Enke) 的《TSQ》文章《集体记忆和1970年代的跨性/别女性主义》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Transfeminist 1970s”) (2018) 的启发，TA (they) 在文章中问道，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有各种复杂性 (the various complexities)，但为什么它被集体记忆为 (collectively remembered as) 仅仅是不包容的、反跨的、白人女性主义 (simply noninclusive, antitrans, white feminism)？恩科敦促我们关注集体记忆，以及它往往更多的是对现在的反映而不是对过去的反映 (a reflection of the present than of the past)。TA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执拗反常地依恋 (perversely attached)”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遗产——这遗产将这个时代框定为仅是对跨性/别者进行伤害和其受害之地 (frames this time as only a place of injury and victimization for trans people) (17)。我附和于此想问 (echo this by asking)，为什么作为一个领域，我们如此执拗反常地脱离了跨性者 (perversely detached from the transsexual)？尽管有许多异质的、多种族的、多阶级的、和跨国的个人 (heterogeneous, multiracial, multiclass, and transnational individuals) 在大学的性别诊所 (the university-based gender clinics) 寻求性再指派手术 (sex-reassignment surgery)，但不知何故，这些跨性者 these transsexuals (或有志于此的跨性者 aspiring transsexuals)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很单一的 (are remembered quite monolithically)，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 (有志于进行手术的) 跨性/别女人 (as white, middle-class, heterosexual (aspiring) trans women)。

我认为恩科的论点非常有说服力的是，这些时刻，这段历史，**我们的 (our)** 历史“值得在一个更大的档案中进行分析” (Enke 2018: 17)。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大学性别诊所的幸运之处在于，由于它们与大学的隶属关系 (their university affiliation)，它们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档案。关于跨性历史 (transsexual history)，我们很难抱怨抹杀和档案缺乏

(complain of erasure and archival lack)。⁹我自己对诊所的研究发现，大学藏品是丰富的调查场所 (rich sites for inquiry)，这些调查挑战着跨儿研究的一些核心信念 (例如，“医学”身份这一概念本身 the very notion of “medical” identity)。¹⁰正如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人所表明的，跨性/别女人和男人自己的言语是现成的 (trans women's and men's own words are readily available)；即使是不再与我们同在的人【逝者，译注】，也有可能找到并放大TA们的观点和生活，并了解TA们的工作和游戏，而不仅仅是作为吸引恐跨的避雷针 (not just as lightning rods for transphobia)” (Enke 2018: 12)。

就像你对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社群中的“坏政治 (bad politics)”之人的问题感兴趣一样，我对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令我们失望的过去之人物感兴趣，因为TA们没有符合某种“激进的”试金石标准 (“radical” litmus test)。这确实是我们的项目相遇和重叠的地方，在关于消极情动/情感和坏对象的问题 (questions of negative affect and bad objects) 上。

⁹ 在我自己的项目中，我探讨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它与跨性性别诊所病人 (transsexual gender clinic patients) 的受限制和被编辑的病例档案 (the restricted and redacted case files of) 有关联。我追随安加利·阿伦德卡 (Anjali Arondekar 2009) 和亚伯兰·路易斯 (Abram Lewis 2014) 等学者的脚步，TA们认为这种缺乏和抹杀的概念 (this notion of lack and erasure)，当它涉及到性别和性意识的档案 (archiv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时，生产了一种关于恢复的方法论 (a methodology of recovery)，即我们总是在寻找那些缺失的东西，希望能将其带入人们的视野。这可以比作伊弗·塞奇威克 (Eve Sedgwick 1990) 的“壁橱认识论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一种支持着隐藏之物对上揭示之物这一二元论的思维模式 (a mode of thinking that upholds a binary of hidden versus revealed)。这种二元论使我们无法对档案进行更复杂的阅读/解读 (more complex reading of the archives)。

¹⁰ 如果我们只听从我们的酷儿历史学家们 (queer historians) 的意见，也许这一切都可以避免：

但我认为，假设医生在本世纪初【20世纪初，译注】创造并定义了“性倒错者”和“同性恋者”的身份 (the identities of “inverts” and “homosexuals”)，假设人们不加批判地内化了新的医学模型 (people uncritically internalized the new medical models)，甚至假设同性恋在1870年代作为一个完全定义的范畴而出现在医学话语本身之中 (homosexuality emerged as a fully defined category in the medical discourse itself in the 1870s)，这都是错误的。这样的假设赋予了 (attribute) 过度的权力 (inordinate power) 至意识形态，将其作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力量 (an autonomous social force)；它们过度简化了，生产了同性恋身份 (gay identities) 的社会条件、意识形态、和意识 (social conditions,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这三者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 (the complex dialectic)，而且它们掩饰 (believe) 了文献本身中所包含的预先存在的亚文化和身份 (preexisting subcultures and identities contained in the literature itself) 的证据。(Chauncey 1982-83: 115)

朱华敏 (ALC)：而且没有比女人更糟糕的研究对象了 (there is no object worse than a woman)。这是我所有工作中的一个运作着的假设 (operating assumption)。对于跨性者的问题 (the problem with the transsexual) 在于，她——从范式上说她是一个她 (paradigmatically she is a she)，特别是如果我们更广泛地谈论20世纪/21世纪的美国文化——身上带着所有性别的包袱 (all the baggage of gender)。像许多女人一样，她的包袱过重 (overpacks)。对于跨性者的问题是，她总是过于是一个女人 (been too much of a woman)。要把女人这种政治上陈旧的东西 (something as politically dowdy as a woman) 变成你所兜售着的 (hawking) 新潮形而上学 (trendy new metaphysics) 的封面女孩 (a cover girl) 是很难的 (见 Hayward and Weinstein 2015; Colebrook 2015; Puar 2015; Bey 2017)。在过去二十年里，谈论酷儿性 (queerness) 或黑人性 (blackness) 变得非常流行，以及最近则是谈论跨儿性 (transness)，在本体论/存在论方面谈论 (in an ontological way)，经常是以海德格尔主义的语气 (often in Heideggerian tones)。同时，如果你蠢到 (dumb enough) 写一本关于女人性 (womanness) 的书，会比你说“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还要快地被所有时髦的学术俱乐部 (the cool academic clubs) 摒弃 (bounced from)，这情况仍存在着。我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应该 (should be) 写关于女人性的书；我只是在指出，没有人可以写 (could)，即使TA们想写，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如果TA们想得到一份工作或书约 (a book contract)，就不行。对比之下，跨儿研究仍然是一个，两个男人可以坐在一起辩论女人作为一个政治类别的优点 (the merits of woman as a political category)，的领域 (Green and Bey 2017)。(剧透提醒：TA们有着自己的怀疑)。

我最近重新翻阅了唐那·哈拉维 (Donna Haraway) 的《赛博格宣言》 (“A Cyborg Manifesto”) ([1985] 1991)，我记起了她在那篇文章中对女人作为一个政治类别 (woman as a political category) 有多么反感 (antipathy)。(这肯定是一个时代标志 a sign of the times：她在八十年代初写作，反抗着 reacting against 我们被教导为是“文化女性主义 cultural feminism”的东西，尽管我对这种分类法 taxonomy 持怀疑态度 skeptical)。赛博格，作为一个新的“神话 (myth)”，旨在作为一种走出女人 (is intended as a way out of women)、走出70年代的普遍主义 (out of the universalism of the

seventies)、并且有可能走出性别 (potentially out of gender) 的方式:“赛博格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 (The cyborg is a creature in a post-gender world)” (150)。

当然,桑迪·斯通 (Sandy Stone) 是哈拉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的学生,同时哈拉维的影响遍布着《帝国大反击》 (“The Empire Strikes Back”),且斯通 (1991: 284) 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跨性/别者在文章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赛博格宣言》实际上被纳入在2006年的《跨性别研究读本》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里。)我同意你对斯通的文章所说的一切:我也在这里怀有巨大的矛盾心理 (harbor great ambivalence)。我注意到斯通和哈拉维之间的联系,只是想说,后跨性 (*posttranssexual*) 不仅仅是一种否定跨性 (disavow transsexuality) 的常识;它也是一种,就像它之前的赛博格 (*cyborg*) 一样,成为后女人 (to be *post-woman*) 的尝试。在她对《性别麻烦》的引用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就像对巴特勒来说,布奇/芬曼文化 (butch/femme cultures) ¹¹既撤销又取代了异性恋 (both recall and displace heterosexuality),对斯通来说,跨性(者)既撤销又取代了女人身份 (the transsexual both recalls and displaces womanhood):“在跨性者这一文本中 (in the transsexual as a text),我们可能会发现将重新塑造的身体映射到 (map the refigured body onto) 传统性别话语上从而颠覆它 (disrupt it) 的可能,利用这一并置 (a juxtaposition) 所创造的不和谐 (dissonances),在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形式结构 (geometries) 中分裂和重组性别元素 (fragment and reconstitute the elements of gender)” (296)。这是一个非常九十年代的举动 (a very nineties move)。没有什么能比找到一个“揭示 (reveals)”性别内部运作 (the inner workings of gender) 的人物更加九十年代了。

¹¹ 取自译者之前的译注:

“butch”一开始指的是性别表达为在社会意义上被视为 (socially-perceived) 男性化 (masculine) 的女同性恋者,又译为“顶”,但如今其含义更指向女性式男性气质 (female masculinity) (可见 Jack Halberstam 的同名专著),同样可理解为是以一种酷儿化的方式表现、展演男性气质 (来自跨儿、非二元者、顺性别者等等)。此处采用“布奇”这一音译以避免性别身份的定式化导致窄化其含义。

“femme”一词的翻译方式与背景同“butch”,常被译为“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所谓的“底 (bottom)”。但现在对“femme”的使用更倾向于解释为对“femininity (女性气质)”的酷儿展演,酷儿化的呈现。也即,顺性别者、非二元者、跨儿、以及酷儿社群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性地挪用这个词,以展现自己对“femininity”的理解。此处采用音译“芬曼”。——译注

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让我觉得，那篇文章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 (*not*) ——表面上看并非如此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 ——斯通在讲述关于作为跨性者之感受的某种本真事实 (*authentic truth*) (如她所声称)；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斯通像九十年代 (以及四十年代，还有我们这十年) 的大多数性别学者 (*scholars of gender*) 一样，在塑造她的对象以符合她的理论 (*molding her object to fit her theory*)，而这并不是巧合地与当时流行的理论 (*then fashionable theory*) 相同。换句话说，医学话语的基本叙事学形式 (*the basic narratological form of the medical discourse*) ——斯通所称的“貌似合理的历史” (*a “plausible history”*) ——实际上基本是完好无损 (*intact*)。斯通所做的只是把那段历史的原始内容 (*the original content*) (疾病 *disease*、诊断 *diagnosis*、治疗 *cure*) 换成了 (*switch out*) 不同的内容，也就是，换成了90年代性别理论的盛行元素 (*the prevailing elements*) (操演性 *performativity*、颠覆性 *disruption*、僭越性 *transgression*)。事实上，她正在为长期存在的智识举动 (*the long-standing intellectual move*) 奠定基础，在这种举动中，跨性/别者仅仅是通过存在于世之为本身 (*the act of existing*)，就成为了一种其它人的性别理论的活体孵化器 (*a kind of living incubator for other people's theories of gender*)。(杰·普罗瑟 *Jay Prosser* [1998] 在九十年代末警告过我们这一点。然而没有人听从)。

埃哈德 (EHD)：后跨性(者) (*the posttranssexual*) 和赛博格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赛博格成为了未来性 (*futurity*)、灵活性 (*flexibility*)、科技性别 (*techgender*)、超现代性 (*hypermodernity*) 等的替身形象 (*a stand-in figure*)，且因为赛博格基本上是后跨性(者) (*the cyborg is essentially the posttranssexual*)，跨性(者) (*the transsexual*) 因此就被贬入了过去。她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 (*She is archaic and anachronistic*)。

非常有趣的是，那些被跨性者利用过的完全相同的医疗程序/手术和技术 (*medical procedures and technologies*)，在它们作为“性别确认手术 (*gender confirmation surgery*)”的后跨性重塑/品牌重造 (*their posttranssexual rebranding*) 中，具有了一套全新的含义。在“人们警告过我们但我们没有听从的事情”的同一脉络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转向尼基·沙利文 (*Nikki Sullivan*) 的文章《变形》 (*“Transmogrification”*) (2006)，她在其中警告对身体改造的等级划分 (*hierarchies of body modification*)。这些关于身体改造的好坏类型的道德判断等级划分 (*these hierarchies of moral judgements about good and bad*)

types of body modification) 不仅存在于主流文化 (dominant culture) 中, 它们也在反文化或亚文化中 (in counter- or subcultures) 形成了自己的形式。具体来说, 我发现沙利文论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她对以下观点的批判——一些类型的身体改造被用来反映 (reflect) 自由意志 (free will)、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和颠覆性政治 (subversive politics), 而同时其它类型的身体改造被用来象征 (symbolize) 教化灌输 (indoctrination)、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和现状 (the status quo)。

尽管沙利文的文章确实纳入了第一版《跨性别研究读本》, 但似乎大多数人都跳过了那一章; 沙利文并没有进入跨儿研究中被反复引用得令人作呕 (get cited ad nauseum) 的文本的简短清单。在酷儿研究和跨儿研究 (queer and trans studies) 中, 关于身体改造的道德判断泛滥成灾, 所有这些都是以反规范政治 (antinormativity politics) 的名义进行的。对我来说, 酷儿理论家们对阴茎成形术 (phalloplasty) 的尖刻谩骂 (vitriol)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你的身体改造看起来太像原初的“跨性医学流派” (the original “transsexual medical genre”), 你的酷儿信誉 (queer cred) 就会完蛋 (toast)。所以我想这是让我感到痛苦 (bitter) 的事情——跨性身体是政治之战场 (the way the transsexual body is the battleground for politics)。你知道, 这不仅仅是政治, 也是身体改造在理论中是如何被接受处理的 (is taken up)。对于酷儿理论来说, 完全相同的手术程序 (the exact same procedures) 怎么能有时象征着过去和其它时间的性别幽灵 (the Ghost of Genders Past) 而有时则是关于可突变、生成、缠结的新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本身 (the very foundation for new materialist theories of mutability, becoming, and enmeshment) ?

朱华敏 (ALC) : 我很高兴你提起新唯物主义 (the new materialisms)。为了这次对话的目的, 我将对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普遍趋势/大趋势 (a general trend) 持不可知论的态度 (agnostic) : 就像所有的学术趋势一样, 它有些是好的, 更多的是坏的, 而大多数是无聊的 (some of it is good, more of it is bad, and most of it is boring)。但我要毫无保留地说, 新唯物主义代表了 (represent) 跨儿研究行进的最糟糕的可能方向 (the worst possible direction)。在理论首先就如此贫乏难以开始的跨儿研究中, 新唯物主义风格的工作 (new materialist-style work) 不知何故占据了 (take up) 不成比例过多的空间, 同时, 坦率地说, 也没有一丁点意义 (not making a lick of sense)。在人文学科中, 这总是一个可怕的论断 (a scary claim); 风险总是在于, 一个人, 在未能理解论据的情况下 (having failed

to comprehend the argument) , 总是将这种失败未能 (failure) 归咎 (imputing) 于论据本身 (the argument itself) 。其后果便是, 我们很不擅长指出胡说瞎扯 (calling bullshit) 。但胡说瞎扯 (bullshit) 是存在的。我敢给你举个例子看看吗?

好吧, 以凯伦·巴拉德 (Karen Barad) 2015年发表在《GLQ》¹²上的一篇文章为例。在这篇文章中, TA¹³向我们保证, TA介入采纳跨儿 (is not taking up trans) 并不是“为了适当地拥抱迎合最新的理论趋势 (in an appropriative embrace of the latest theory trends) ” (413) 。然后TA写了这样的东西:

物质 (matter) 是对跨*生命性、自我实验/自我-再-创造的疯狂探索 (a wild exploration of trans* animacy, self-experimentations/self-re-creations) , 不是在一种自生模式 (an autopoietic mode) 中, 而是相反, 在对“自我”和个人主义的一种根本消解 (a radical undoing of “self,” of individualism) 中。它永远是充满生气的 (ever lively) , 从不与自己完全同一 (never identical with itself) , 它是不可计数的多重的、可变的 (it is uncountably multiple, mutable) 。物质不是单纯的存在 (matter is not mere being) , 而是其持续的消解/行动 (but its ongoing un/doing) 。自然是, 在其持续的重新 (塑造) 配置过程中的, 能动的跨*物质性/跨-物质-实在 (Nature is agential trans* materiality/trans-matter-reality in its ongoing re(con)figuring) 。 (Barad 2015: 411)

在这篇文章中, 跨 (*trans*) 没有做任何理论工作; 它在这里纯粹是作为巴拉德多年来一直在讲的一个论点的一个时髦装饰品 (an au courant garnish) 而使用。我可以很容易地向你证明这一点。这是巴拉德在2012年《*differences*》发表的文章, 做着TA自己在做的事情:

¹² 现名为《蕾丝边和基研究期刊》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见 <https://read.dukeupress.edu/glq> 。——译注

¹³ 原文对 Karen Barad 使用的代词是she/her, 然而只要浏览下UC Santa Cruz的官网就可以发现 Karen Barad 只使用they/them代词。见 https://campusdirectory.ucsc.edu/cd_detail?uid=kbarad 这样的问题也在许多学者对 Judith Butler 的描述中。译文只使用they/them来描述 KB, 即译为“TA”。——译注

那么，每一个层次的触摸 (touch)，本身都被所有可能的它者所触摸 (is itself touched by all possible others)。因此，自我触摸 (self-touching) 是与自我的无限它异性的相遇 (an encounter with the infinite alterity of the self)。物质是一种包裹折叠 (an enfolding)，一种纠缠 (an involution)，它不由自主地触摸自己，在这种自我触摸中，它接触到它本身的无限它异性 (infinite alterity)。多形的反常变态性 (polymorphous perversity) 被上升至一种无限力量 (an infinite power)：我谈论的是一种酷儿亲密关系！ (talk about a queer intimacy!) (Barad 2012: 212-13; 原文斜体字删除)

现在，TA在这里提出了完全相同的主张，TA直接回收重新使用了这些句子，并在2015年的注释中承认了这一点 (我把新的部分用斜体表示)：

那么，每一个层次的触摸 (touch)，本身都被所有可能的它者所触摸 (is itself touched by all possible others)。粒子的自我-内在-相互作用 (**self-intra-actions**) 需要粒子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这是一种各形式的激进消解 (**a radical undoing of kinds**) ——酷儿变革/跨儿*变革 (**queer/trans*formations**)¹⁴。因此，自我触摸 (self-touching) 是与自我的无限它异性的相遇 (an encounter with the infinite alterity of the self)。物质是一种包裹折叠 (an enfolding)，一种纠缠 (an involution)，它不由自主地触摸自己，在这种自我触摸中，它接触到它本身的无限它异性 (infinite alterity)。多形的反常变态性 (polymorphous perversity) 被上升至一种无限力量 (an infinite power)：我谈论的是一种酷儿/跨儿*亲密关系！ (*talk about a queer/trans* intimacy!*) (Barad 2015: 399)。

那么，是哪一种呢，凯伦？物质是酷儿 (queer)，还是物质是跨儿 (trans)？当然两者都是，因为对TA来说，就像对大多数声称从事跨儿研究的人一样，酷儿 (queer) 和跨儿 (trans) 显然是同义词。如果我听起来对此很生气，那很好。我就是这样。

但让我们试着做一回好的变性人 (trannies) 吧。这些天，什么学术工作让你感到高兴？

¹⁴ 可理解成 trans* formation，以及 transformation，因为原文“trans*”和“formation”之间没有空格。
——译注

埃哈德 (EHD)：我对凯拉·舒勒 (Kyla Schuller) 的新书《感觉的生命政治》 (*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2018) 感到兴奋，因为它对你我都觉得使人恼火的这些重新 (塑造) 配置和 (消解) 行动之理论 (these theories of re(con)figuring and (un)doing) 进行了反击。经由科学史，她认为感想 (impressions) 和易感性 (impressibility) (产生情动和受情动影响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 是内在于 (are baked into) 生命权力的结构本身 (the very structure of biopower) 中的，因而也在种族、性、和物种的现代概念中 (the modern concepts of race, sex, and species)。“那些试图以灵活物质性 (flexible materiality) 来挑战生物决定论 (biological determinisms) 的当代框架 (contemporary frameworks) 并没有摆脱自由人文主义的政治遗产 (political legacies of liberal humanism) ——相反，它们不知不觉地重述了 (recapitulate) 感觉之生命政治的概念装置 (the conceptual apparatus of 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11)。我对她所说的话的含义 (implications) 很感兴趣，因为它与跨儿理论有关，特别是“跨 (trans)”既作为前缀又作为动词 (a prefix and verb) 都被用作为以摆脱走出人类的定式二元对立 (fixed binaries of the human) 的一种理论捷径 (a theoretical shortcut)。舒勒的论点是，可塑性 (plasticity) 实际上是种族科学 (racial science)、生物学、和遗传学 (heredity) 的核心所在。受情动影响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be affected)，改变和适应和缠络卷入 (enmesh) 一个人的周遭环境的能力，实际上被视为“文明开化”的一个标识 (a marker of “civilization”)。在这个框架中，跨(儿)化 (transing) (即，边界跨越 boundary crossing) 失去了其对激进政治的牢牢把握 (loses its purchase on radical politics)。

朱华敏 (ALC)：正如我所说的，我不能忍受跨(儿)化 (transing)。名词动词化/动词ing 并不能创造一种理论 (Verbing does not a theory make)。但如果我们不得不坚持下去，跨(儿)化 (transing) 应该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从每个人的性别都是一场政治灾难并拒绝修复它 (everyone's gender is a political disaster and refuse to fix it) 这一前提 (the premise) 出发的方法论。玛丽沙·布罗斯托夫 (Marissa Brostoff 2017) 最近在《*differences*》中发表的关于凯特琳·詹纳 (Caitlyn Jenner) 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是我很久以来读到的，也许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跨儿研究学术工作之一。她的主张基本上是，詹纳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 (unwittingly engaged in) 一个坎普表演 (camp performance)，其对象是酷儿政治本身：正如变装皇后 (the drag queen) 曾经为巴特勒揭示了性别的脆弱惯例 (the

fragile conventions of gender) 一样, 凯特琳·詹纳, 以及在她的短命真人秀节目《我是凯特》 (short-lived reality series *I Am Cait*) 中对“跨儿行动主义 (trans activism)”进行的胆怯、半途而废的尝试 (her timid, half-assed attempts), 现在则揭示了政治本身的脆弱惯例 (the fragile conventions of *the political as such*)。这是一篇美丽的文章以及一个精明的论点。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这些作品拒绝反规范性之盛况 (the pomp of antinormativity) 以及后人类之境况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posthuman), 而选择更慢、更小、更关注 (more tuned in to) 普通生活 (ordinary life) 无法符合 (fails to measure up to) 我们强加给 (thrust upon) 它的政治分析的方式, 的东西。

当然, 在某些时候, 这种思考线路会让你完全离开学术界。(这是我由衷希望的圆满结局。’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 我们在计划这次对话时曾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真的 (*really*) 想颠覆这个领域的正统虔诚 (the pieties of the field), 我们就会放弃我们选择的话题, 而只是坦率直白地谈论我们作为跨性者的生活, 就像我们在晚餐或短信中交谈的方式。当然, 我们不能这样做, 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端正 (academic decorousness), 而是因为在让读者读到关于作为跨儿 (being trans) 的真实感受之前, 《TSQ》的版面就会先失火身处争议 (catch fire)。

我言过其实了。有一点点。

朱华敏 (Andrea Long Chu) 是一名作家、评论家、和纽约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她的文章已经或即将出现在 *n+1*、*Artforum*、*Bookforum*、*Boston Review*、*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4Columns*、*Difference*、*Women and Performance*、*TSQ*、和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她的书《女性：一种问题》 (*Females: A Concern*) 即将出版【本书现已出版, 译注】。

埃米特·哈辛·德尔格 (Emmett Harsin Drager) 是南加州大学美国研究与族裔 (American Studies and Ethnicity) 的博士候选人。埃米特的论文暂定名为《将被识见：跨性者与医学凝视》 (“To Be Seen: Transsexuals and the Medical Gaze”), 主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学性别诊所 (the university-based gender clinic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Barad, Karen. 2012. "On Touching: The Inhuman That Therefore I Am." *differences* 25, no. 5: 206–23.

Barad, Karen. 2015. "Transmaterialities: Trans*/Matter/Realities and Queer Political Imaginings." *GLQ* 21, nos. 2–3: 387–422.

Beemyn, Brett Genny. 2006. "Autobiography, Transsexual." *Glbtc.com* (blog), www.glbtcarchive.com/literature/autobio_transsexual_L.pdf (accessed October 1, 2018).

Berlant, Lauren.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y, Marquis. 2017. "The Trans*-ness of Blackness, the Blackness of Trans*-ness." *TSQ* 4, no. 2: 275–95.

Brostoff, Marissa. 2017. "Notes on Caitlyn, or Genre Trouble: On the Continued Usefulness of Camp as Queer Method." *differences* 28, no. 3: 1–18.

Butler, Judith. (1990)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udith.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Chauncey, George. 1982–83. "From Sexual Inversion to Homosexuality: Medicine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Female Deviance." *Salmagundi*, nos. 58–59: 114–46.

Chu, Andrea Long. 2018. "On Liking Women." *n + 1*, no. 30: 47–62.

Colebrook, Claire. 2015.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Human?" *TSQ* 2, no. 2: 227–43.

Dinshaw, Carolyn. 1999. *Getting Medieval: Sexualities and Communities, Pre- and Postmoder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Edelman, Lee. 2004. *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Enke, Finn. 2018.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Transfeminist 1970s: Toward a Less Plausible History." *TSQ* 5, no. 1: 9–29.

Garfinkel, Harold. (1967) 2006. "Passing and the Managed Achievement of Sex Status in an 'Intersexed' Person." In Stryker, and Whittle, 2006: 58–93.

Green, Kai M., and Bey, Marquis. 2017. "Where Black Feminist Thought and Trans* Feminism Meet: A Conversation." *Souls* 19, no. 4: 438–54.

Halberstam, Jack. 2005.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Donna. (1985) 1991.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149–82. New York: Routledge.

Hayward, Eva, and Weinstein, Jami. 2015. "Introduction: Tranimalities in the Age of Trans* Life." *TSQ* 2, no. 2: 195–208.

Preciado, Paul. (2008) 2013. *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Translated by Benderson, Bruce.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Prosser, Jay.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uar, Jasbir. 2015. "Bodies with New Organs: Becoming Trans, Becoming Disabled." *Social Text*, no. 124: 45–73.

Rondot, Sarah Ray. 2016. "'Bear Witness' and 'Build Legacies':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Century Trans* Autobiography." *a/b: Auto/Biography Studies* 31, no. 3: 527–51.

Sedgwick, Eve.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uller, Kyla. 2018. *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 Race, Sex, and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David. 2004. *Conscripts of Modernity: The Tragedy of Colonial Enlighten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hah, Nayan. 1998. "Sexuality, Identit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In *Q&A: Queer in Asian America*, edited by Eng, David L. and Hom, Alice Y., 141–56.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ingal, Jesse. 2018. "When Children Say They're Trans." *Atlantic*, July/August.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7/when-a-child-says-shes-trans/561749/

Stone, Sandy.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In *Body Politic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edited by Epstein, Julia and Straub, Kristina, 280–304. New York: Routledge.

Stryker, Susan. 2004. "Transgender Studies: Queer Theory's Evil Twin." *GLQ* 10, no. 2: 212–15.

Stryker, Susan, and Aizura, Aren, eds. 2013.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 New York: Routledge.

Stryker, Susan, Currah, Paisley, and Moore, Lisa Jean. 2008. "Introduction: Trans-, Trans, or Transgender?" *WSQ* 36, nos. 3–4: 11–22.

Stryker, Susan, and Whittle, Stephen, eds. 2006.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Sullivan, Nikki. 2006. "Transmogrification: (Un)Becoming Other(s)." In Stryker, and Whittle, 2006: 552–64.

White, Hayden V. 2000.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iegman, Robyn. 2012. *Object Less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iegman, Robyn, and Wilson, Elizabeth A., eds. 2015. "Queer Theory without Antinormativity." Special issue, *differences* 26, no. 1.

Wilderson, Frank B.III. 2010. *Red, White, and Black: Cinema and the Structure of U.S. Antagonism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